

村落视野下的农村教育

以西南四村为例

翁乃群/主编

Chinese Rural
Education in the Village
Perspectives

4 Ethnographies
of Rural Educ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村落视野下的农村教育

以西南四村为例

翁乃群/主编

Chinese Rural
Education in the Village
Perspectives

Ethnographies
of Rural Education
Southwest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村落视野下的农村教育：以西南四村为例/翁乃群主
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

(当代中国研究论丛)

ISBN 978 - 7 - 5097 - 0605 - 3

I. 村... II. 翁... III. 乡村教育 - 研究 - 中国
IV. G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3702 号

· 当代中国研究论丛 ·

村落视野下的农村教育

——以西南四村为例

主 编 / 翁乃群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址 / [http: // www. ssap. com. cn](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85117871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负责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陶盈竹

责任校对 / 崔冬梅 赵士孝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张 / 19.4 字数 / 337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605 - 3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鸣 谢

在为这一本关于农村教育的田野志集的出版而感到高兴之际，我要代表本文集的其他四位作者向为我们开展这项研究提供了经费、设备和才智支持和帮助的机构、机构领导和同事们深深表示感谢。首先我们要特别感谢美国福特基金会，美国福特基金会前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 Watson）先生、原负责教育和文化项目顾问白杰瑞（Gerard A. Postiglione）先生以及现任负责教育和文化项目顾问何进先生对本研究项目给予的资助和支持。我们还要特别感谢韩国学术交流基金对本文集的出版给予的资助。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郝时远所长、开展本研究期间时任该所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室主任纳日碧力戈研究员给予本研究项目的大力支持、帮助和鼓励表示深深的谢意。

与此同时，我们特别要感谢在开展田野调查期间向我们敞开心扉，与我们分享自己的乡土信息、知识和感受的村民百姓、学校老师、乡村基层干部，以及所在省地县教育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另外，我们还要借此对为我们提供食宿和给予无微不至帮助的村民致以万分的谢意。正是从他们提供的信息、知识、感受和给予的关怀中，我们得以从具体的农村社会田野研究中，对农村基础教育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并最后完成本田野志集的撰写工作。2003

年当我们完成了初稿时，曾邀请田野地为我们提供信息的村民、乡村学校负责人的代表、所涉地方各级教育部门的代表以及相关学者共二十多人参加我们在昆明举办的一个为期两天的小型讨论会。与会者在会上对我们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和批评对我们后来的修改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支持。借此向他们再次致谢。

2008 年 10 月

前 言

翁乃群

从 2001 年春季到 2003 年春季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和四位同仁沈红、刘云杉、吴凤玲和李小敏分别在西南川滇黔三省的四个农村地区开展了“中国西南农村教育的社会文化建构”课题研究。该项目所指涉的“农村教育”是国家在农村推行的九年义务教育。选择西南三省农村为田野点是因为该研究主要关注少数民族农村教育。四个田野点的村民除了涉及少数汉族外，主要有纳日人^①、普米族、藏族^②、彝族、布依族、壮族^③、苗族等少数民族。这项课题研究主要采用了人类学参与式田野调查研究方法。虽然在调查时间上，我们并没有达到通常人类学调查至少为期一年，

① 纳日人即为李小敏和吴凤玲的调查报告中所称的摩梭人。在国家民族识别中被识别为纳西族的一支。纳日或纳是他们的自称，摩梭为他们历史久远的他称。20 世纪 80 年代初云南一侧纳日村民要求改称为摩梭，以示与自称为纳西的族群的区别，该要求后来被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认可。而居住在四川一侧的同族村民，则在部分精英的要求下被认定为蒙古族，也取得四川人民代表大会的认定。

② 这里指的是四川境内自称“普米”、在国家民族分类中认同藏族的村民。在地方语境下这部分藏族在社会文化上与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境内的普米族同属一个族群。

③ 在当地被称为仲家。据说他们祖上是从贵州迁来的，20 世纪 50 年代在贵州的这一支人被识别为布依族，而他们则被划为壮族。这是源于与贵州布依同一自称的族群，在广西被识别为壮族。

即一个最短的社会周期的要求，但在两次累计为期三个月或以上的调查过程中我们都是居住在村寨的村户中，并与受教育主体及其家长和社区民众有着许多深入的交谈，对他们包括经济的和文化的社会生活有着较深入的观察和了解。此外，课题组成员翁乃群对川滇的两个调查点以及黔西南的调查点或地区均曾开展过较长期的田野调查。沈红在其调查点的研究则持续了多年。

该研究与以往许多农村教育研究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是以质性研究为主，量性研究为辅。如果说以往农村教育研究更多地反映入学率、辍学率和完学率三个量化指标，我们的研究则主要关注的是被假设的农村教育相关受益者，学生及其家长和社区民众是如何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赋予农村教育以意义的。不同于以往国内农村教育研究中充斥着“经济”视角和“客位”（etic）视角，该研究则更多地强调“社会人文”视角和“主位”（emic）视角。在调查过程中，除了与这些“受益者”有较多交流外，我们与当地村小的校长和教师，农村教育的最基层实施者也有较多的交流。研究中我们并没有采用结构性的问卷方式，而主要是在通过参与观察所获得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基础上，进而与村民进行开放式的访谈和交流。采用此种访谈和交流方式的目的是克服以研究者为中心的研究倾向，促使受调查者主体性的充分表达和发挥，减少研究者的社会文化偏见，以求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被研究社会主体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理性和意义。在以往研究中存在着农村教育实践的两个主体，即国家各级教育机构及其成员的教育实施方，和受教育者及其家长和社区民众的被实施方或被假设为教育的受益方，对被实施方文化和观念“落后”的责怪往往多于对实施方及其教育宗旨、导向和内容的反思。与上述以往研究倾向不同，本文集更多的则是对农村教育宗旨、导向和内容的反思和批评。

一些欧美学者在论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时，多将其视为国家建构过程，以及作为国家主流文化代表的汉族文化对少数民

族的同化进程。^①事实上,这种现象并非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具有全球性意义的现代国家建设和国族建构的重要过程。应该指出,在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自治区或州、县里,中、小学校不仅普及汉语教育,同时也推行少数民族语言教育。虽然民族国家被想象为现代国家(nation-state)的范式,但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凤毛麟角。尤其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进一步推进,致使全球人口流动在数量、频率和速度上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随之也造成了少数原本在族群、语言和文化上较为单一的国家也日益多元化。在多民族或多文化国家中,规定在学校教育中使用国语或官方语言便是国家建构的重要过程。^②这一过程通常变成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的强势同化过程。在当今时空被高度压缩,人、物、资金和信息高度流动的全球化背景下,寥寥无几的民族国家也正受到“外来文化”史无前例的冲击和挑战,如在国际上处于强势地位的英语在不断冲击着其他处于弱势位置的语言。在越来越多的非英语国家中,英语课程成为学校语言教育中仅次于国语的重要课程,甚至成为超越本国国语的课程。这种现象在中国也已变为事实。^③在全球化过程中,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欧美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渗透到本土文化中去,成为各国、各地、各族群或社群文化,特别是它们的城市文化再生产的不可或缺的“佐料”。

① Postiglione, Gerard A. (ed). *China's National Minority Education: Culture, Schooling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London: Falmer Press, 1999; Hansen, Mette H. *Lessons in Being Chinese: Minority Educ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in Southwest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② Postiglione, Gerard A. "Introduction". In Gerard A. Postiglione (ed) *China's National Minority Education: Culture, Schooling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London: Falmer Press, 1999: 3-19.

③ Upton, Janet L.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hool-Based Tibeta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PRC". In Gerard A. Postiglione (ed) *China's National Minority Education: Culture, Schooling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London: Falmer Press, 1999: 281-339.

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今中国作为主流文化的汉文化也具有显著的多元性。城乡文化差异便是中国多元文化中最普遍和突出，且又往往因为司空见惯而不被认真对待的一个现象。因此，把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放到农村教育的分类体系中或许具有更加普遍的解释力。因为在以往的国家义务教育中，对于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农村百姓来说，农村教育是城市教育的粗劣复制。农村学校变成具有主流地位和多元性的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进行改造的场域。

几千年来城乡二元社会下，我国的教育具有了城市导向的性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乡二元社会在人民民主专政和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户籍和粮食分配制度，被高度制度化。在这种制度下，义务教育也就承载了城乡社会流动重要门径的功能。“学而优则仕”对农民和农村居民来说变成具有“学而优则非农”，“学而优则市民”的实践意义。与此同时，一方面鼓励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另一方面是“学而优”的农民被源源不断地通过教育从农村“发掘”和“掠夺”进城市里来，成为城市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资源。问题的关键是农村教育并没有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知识和技术支持，没有培养更多的适应农村发展需要的有用人才，相反是培养了农村社会的“不适应”或“叛逆”者，并一味“追求”为城市的社会发展培养和输送人才。因此，从衡量农村基础教育的前述三个量化指标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隐喻了农村基础教育的成功与否是以有多少农村人才被城市“发掘”出去为标准的。与此同时，对农村受教育青少年和送他们上学的家长来说，是否从农村基础教育中受益即是指能否走出农村成为干部、成为“挣工资的”城镇居民，总之能否从中跳出农门，走出农村。除此之外，他们从来不认为或奢望基础教育能给他们在农村发展带来其他更多的益处。

从本文集中，读者不难看出我们的研究并非是对我国农村教育的宏观研究，而是解剖麻雀式的微观研究，但并不缺乏对我国农村教育的宏观关怀，和见微知著的思考。本文集一共收集了两篇论文

和四篇田野志 (ethnography)。在《城市导向的农村教育》一文中,作者根据以往的田野经验,讨论了被假设的农村教育相关受益者及其社区赋予农村教育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他们的应对实践。作者还分析了农村教育背后的城乡二元社会文化结构关系,以及精英教育制度下农村教育的城市本位和城市导向。由于教育宗旨、教育导向和教学内容与城市高度统一,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文化高度分离。农村学校与村落之间构成中心与边缘、文明与落后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教育变成了为城市的教育,而并没有为农村社会文化发展培养人才,提供知识和技术资源。相反,农村教育下的受教育者普遍与农村社会“离心离德”,追求离开农村和农业,变成非农业人口。

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学校教育在“文明”的强势话语下,往往有意无意地否定少数民族文化,忽视少数民族的“人观”、宗教信仰、文化理念和文化遗产。这些否定和忽视往往构成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障碍。在城市本位和导向的农村教育下,一旦学生未能继续升学上中专、大专或大学,未能走出农村变成非农身份,未能找到挣工资的工作,学生和家长往往产生强烈的挫折感。读书,升学,走出农村挣工资,变成大多数农村家长送孩子上学的初衷,也是他们衡量读书有用的基本标准。农村家长送子女读书的初衷与国家农村教育的导向在这一点上达到了“不谋而合”。

作者还追根溯源指出在我国这种城市本位和导向的农村教育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渊源。“学而优则仕”以及隋朝始建并延续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均为外导向精英教育的历史传统。虽然“旧学”从根本上也是外导向的教育制度,但在乡土社会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士绅社会组织中和声誉制度、“耕读”理念下,农村并不缺乏“读书人”的用武之地,而他们在私塾和乡学里所受到的儒学教化,则是乡土社会伦理和道德秩序有用的知识。^①换言之,“旧学”是

① 罗志田:《科举制度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根本制度之一。与此相反，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引介的新学，对乡土社会来说是输入型的、异质的，是与乡土社会相分离的。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出现了一批诸如陶行知、晏阳初等致力于乡村改造的有识之士。他们在大力开展乡村建设试验的过程中曾经成功地推行新型的，以改造和发展农村社会为目的的乡村教育。但后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些乡村教育改造运动未能持续进行下去。解放以后，陶行知和晏阳初的乡村教育模式并没有被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总结与改进。相反，在对农村现代化的机械和教条化理解的背景下，这些较为成功的农村教育经验被有意无意地遗忘或贬抑。因此重新认识和借鉴他们的经验，改变农村教育的城市本位和导向，使之适应农村社会文化和农村发展的需要是改善当今农村教育状况和提高教育成效的有益途径。

在《村落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力空间——滇西北永宁乡拖支村田野调查》的田野志中，李小敏通过对川滇边境西北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拖支村教育的调查，描述和分析了在村落社会文化背景下乡土社会和乡土知识体系与学校和学校知识体系的空间权力关系及其互动实践。学校的知识体系是以代表国家和现代化的城市文化和知识为本位和导向的。因此，学校与村落社会成为相互隔离的空间，农村小学成为“村落中的国家”^①。城市本位和导向的农村教育人为地将乡土知识和现代文明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在这样的预设下，农村学校传授的知识不是“躬耕山林的知识，而是走入庙堂的知识”。农村教育在知识资源上是输入型的，即外来的，在产出上则是输出型的，即外出的。不论对农村社区民众还是对国家来说，这种与农村相脱离的农村教育成为高投入低产出的教育制度。只有极少数学生能够通过升学走出农村，而大量未能通过升学走出

① 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农村的学生则往往至少在其人生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农”与“非农”身份的困惑之中。在未能通过升学走出去而留在农村的受教育者中，大多数人的感受是学校的教育并没有或很少给他们带来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虽然他们身子来自农村，但在学校教育的潜移默化下，思想却变得“不适应农村”。他们中有的变成了游荡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游民或城市边缘人，甚至“街痞子”。外向型的国家教育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学生，尤其他们的家长和社区民众所内化了。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和学生都将升学率作为衡量、考核学校工作和评价学校好坏的标准，而农民则是以“读得出来”与“读不出来”、“走得出去”与“走不出去”作为衡量上学成败的标准。虽然表述不同，但逻辑一致。同此逻辑，在以“女祖男后”为社会性别结构关系的纳日社会中，虽然不存在对女性的歧视，但它也有着重男轻女的社会文化，普遍存在女性青少年继续升学的严重障碍。

基于上述思考，作者也因此提出汲取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诸如陶行知、晏阳初的乡村改造运动的先行者们的经验，强调教育与生活经验相结合，以乡村建设为本位，因地因时办教育。“在承认‘平等而一体化’的文化格局下，首先需要确立地方性知识资源的价值和合法性”，消除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的对立，“恢复和增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能产性，重构民族认同和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将国家教育和地方性知识有机地整合，使国家教育更好地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服务。

吴凤玲的《村落社会文化与国家教育——川西南泸沽湖镇一村小及其所在村落的田野调查》一文所描述和分析的村落与李小敏调查的村落在行政区划上分别属于川滇两省相邻的两个乡镇。在文化上，两个田野点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同一个文化社区。这两个田野点上居住的主要族群都是纳日人和彝族。虽然地方性教育政策和实践存在差异，但在教育宗旨和导向上并无不同，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本土社会主体赋予农村教育的意义有许多相同之处。在该文

中吴凤玲较为详尽地描述了该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以及农村教育所遇到的问题，并从当地农村教育的两方面主体，即农村教育的实施方和被实施方，分析了当地农村教育问题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在讨论经济因素时，她不仅涉及村户经济收入低的问题，还描述和分析了在家庭承包土地生产责任制、当地粗放型半农半牧经济背景以及村户对诸如柴薪需求较高的生活方式下，在维持村户日常生产和生活的活动中，存在着对包括学龄少年儿童劳动力需求较高的问题。在传统经济生产方式和当地自然环境条件下，村户劳动力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该村户可利用和获取的自然以及社会资源的多少。换言之，他们的经济生产方式更多地依赖于劳动力的多少而不是技术力量的高低。显然，农村经济生产方式的欠发展，也表明由于农村教育的城市导向，它们并没有起到传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技术知识的作用，也难以使教育“受益”对象（包括学生及其家庭和社群）真正感受到得益。

在讨论社会文化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影响时，吴凤玲对摩梭、汉族和彝族村民中普遍存在忽视女性少年儿童教育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作了区别。与李小敏前文一样，她没有将其归咎于“重男轻女”。对摩梭村民来说，恰恰是女性在家户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家户导向”的社会文化导致了与外导向的学校教育发生更多的冲突，使摩梭家户长辈们对送女性学龄儿童上学存在着更多的忧虑和障碍。虽然摩梭社会以女性为中心且重女不轻男，但与当地重男轻女的汉族和彝族社会文化一样，他们的女性少年儿童上学和升学率普遍低于他们的男同胞。而彝族家庭中，“女孩早晚要嫁出去成为别人家的人”则是家长们不愿送女孩上学的重要原因。对于摩梭村户来说，家户中选择一至两个男性少年儿童去学经当喇嘛，既是他们宗教信仰的需要，也是他们提高家户声誉以及增加家户经济收入的一种选择和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要求发生摩擦，使部分摩梭男性少年儿童难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国家要求。如何使当地农村教育因地制宜地适应村民的宗教生活需要，

成为推进当地农村教育的一个挑战。在该田野报告的后面部分，吴凤玲对当地政府推进农村教育的举措和“三个代表”教育活动及扶贫开发工作相结合的试点，以及村民们的反应做了简略的描述。最后她根据自己的观察分析提出了改进农村教育的建议。

在《贫困乡村教育的文化嵌入——黔西北石门坎的田野调查》的田野志中，沈红根据自己在贵州苗族边远山村石门坎的多年田野调查，对那里农村教育的兴衰沉浮发展历史进行了描述和分析。石门坎苗族中的现代教育始于20世纪初，由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牧师柏格里（Rev. Samuel Pollard）创建的教会学校。后经20世纪50年代政府对这些教会学校的接管，那里的现代教育自创建至今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现在那里的完小已发展成为全县唯一建在村子里的县直属学校。在研究中，沈红以石门坎为例“把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轨迹，放置到宏观历史演替的时间轴上，同时也放置在一个具体的村落空间中来观察”。通过大量访谈努力听取石门坎村民的声音，作者力图把握好当事人对当地教育变迁史的记忆、理解和认识，并运用这些对当地教育问题进行了诠释。

现在石门乡存在着两种文化教育：一种是以汉语为基本传授语言的公办教育，当属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种是以（老）苗文为传授语言的民间教育，当属地方宗教信仰活动和苗族文化传承相结合的社会实践。一百多年前当地苗族皈依基督教是当时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背景下他们的一种选择，借用马克思的话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正是在对苦难抗争的过程中，他们增强了族群认同的集体意识和自觉，其中包括皈依基督教以及对民族文化和现代教育的追求。在柏格里牧师和当地苗族精英的努力下，老苗文的创造就是族群认同和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实践。值得指出的是，老苗文的学习和传承既是这种实践的继续，也是他们宗教信仰的实践。老苗文已成为信仰基督教的当地苗族内在化的文字语言，是当地苗族宗教信仰、现代教育和社会生活中用于沟通的文字语言，具

有地方性社会文化的内在功能。20世纪50年代以前，教会学校的成功与它们以当地社会文化需要为本，为当地的社会发展服务密切相关。因此，对于村民来说上学受教育出于内在社会文化的需要。贫苦的苗族村民自发地出资出力共修学堂，便是这种内在动力的最好表达。也正因为如此，当时以教会学校为代表的现代教育能够兴旺成功，以至于石门坎成为川黔滇三省苗族文化的中心。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民族平等”的政策下我国的语言专家在部分苗族精英的参与下，以及参照老苗文的基础上，用拉丁字母为苗族创造了新苗文。新苗文的创造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并没有从当地苗族民众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要出发。加上新苗文不以当地苗语方言为核心参照系，而是基于多个苗语方言的综合，因此新苗文的教育和传播不同于老苗文，只停留在行政部门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广上，而没有被当地苗族化为内在的需求和愿望，进而变为他们的自觉实践。老苗文的生命力则是可以从“文革”期间村民对它的学习没有停止，并将它寓于当时被禁止的基督教民间宗教活动中看出。当今苗族村民上教堂学老苗文的其中重要动力，即“我是苗族，我想学苗文”，或许它也同样在许多苗族过去上教会学校读书的内在动力的一个延续。旧有教会学校采用的双语教学、由苗族精英因地因时制宜自编的《滇黔苗民夜读课本》（又称《平民夜读课本》）和“以苗教苗”均为当时石门坎苗族现代教育得以成功的重要经验。在石门坎旧有的农村教育宗旨和导向下，石门学校培养的学生“送得出去，请得进来，请进来的也留得下来”。20世纪上半叶石门乡苗族曾经有过辉煌的现代教育，与当时苗族村民主体性的被动员和充分发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些无疑都是改造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使之成功的很好的经验。比较石门坎旧有学校“穷人的学校”的定位，该篇田野志的作者对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当今农村基础教育已经和城市教育一样越来越像“专为富人安排的一桌宴席”的倾向提出了警示和批评。

在《村庄与教育——黔西南一个民族混居村庄的田野研究》

的田野志中，刘云杉根据两次总共三个来月的田野调查生活经验、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深入访谈所得，对被调查村寨的社会文化和基础教育做了生动的描述、深入的阐释和分析。在报告中既有被调查者的声音，也有作为研究教育的学者对被访谈者言语内、外意义的解释和思考，还有他们之间的思想冲突。这些解释和思考基于对当地社会文化和历史，以及被访谈者社会生活的参与观察和熟悉程度。根据许多报告人的生活经历和事件，作者探究了不同历史时代农村教育在村民身上留下的集体历史印迹。作者还通过对在一北方城市小学和黔西南本调查村落小学语文课文“坐井观天”授课过程的观摩的比较，以及对调查点学生社会生活的观察，生动且深刻地揭示农村教育宗旨的历史承继和现代表述，以及农村教育“受益者”主体性的缺失，知识的城市中心和城市导向的“霸道”。“你们长大后想穿皮鞋还是布鞋？想穿皮鞋，就用功读书；你们长大后想坐牛车还是开汽车？想开汽车，就用功读书；你们长大后想坐飞机在天上飞还是像牛一样耕地？想在天上飞，就用功读书吧！”正是通过这些历史印迹，作者深刻地反思了现今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忽略农村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需要的严重问题。以城市为中心、脱离农村自上而下的农村教育并没有促使村民滋生接受教育的内在动力或积极性。作者报告文学式的田野调查报告，穿插着调查过程中作者与村民的思想冲撞、作者本人的感受和思辨，使得报告变得真切和生动，其中寓含着敏锐而又深刻的分析和见识。

在《中国乡村教育实践的检讨》一文中，刘云杉根据自己田野研究的感受，以及梳理 20 世纪上半叶背负改造农村远大志向的农村新学实践者的经历，及对当时研究我国农村社会的外国学者在农村引入新学观点的评说，从学理上以及宏观和历史维度，对“外源性”和“输入型”农村教育的实践经验及其得失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这种反思对永无止境、因地因时制宜的农村社会改造中的农村教育改造实践是非常必要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总结和检讨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著名教育精英将农村教育和社会改造相结合的实践，以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国家推行农村教育的历史经验，无疑对当下推动和发展农村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农村的基础教育从来就不只是教育问题。在当下它和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农村社会的发展以及农村人口转移问题联系在一起。最终它与国家的发展进步密切相关。当今外导向的农村基础教育不仅没有为农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也因为一味追求升学率和精英教育，缺乏根据劳务市场、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知识和技能予以传授的经验，致使农村教育也没能为农民从农村向城镇转移提供知识和技能准备。以城市为导向的农村教育不仅没有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和培养人才，也没能很好地为我国社会的城镇化发展提供掌握所需知识和技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从本田野志集中读者可以发现四位作者之间有许多共识。但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对农村基础教育要以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为主要导向、要在农村教育中引入本土知识和文化技能的强调程度上，以及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造成农村基础教育衰退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以及上述因素超越经济因素的看法上存在着一些差异。这恰恰正是本田野志集作者们的共同追求，即学术的进步靠的不是一种声音，而是“百家争鸣”和批判的精神。从开始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和后来的写作和编辑过程中，我们五位作者曾有多次交流，但作为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和本文集的主编，笔者并没有追求统一的观点和意见，而是保留作者各自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不仅是因为研究者学科背景和所持的学术理念存在一些差异，人生经历也不相同，更重要的是所调查的社区在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作者之间存在观点和意见的差异是非常正常且自然的，也是学术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